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一詞的興起與演變

——以1901至1935年為限*

胡 婉 庭**

摘 要

本文藉由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搜尋出1,000多條「民族主義」辭彙，分析1901-1935年間「民族主義」一詞出現次數及運用的情形，以探討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語彙的興起與演變。內容主要是從歷史背景、語意溯源、定義主旨三方面著手，先探討清末報刊文獻如何介紹西方的「民族主義」一詞，再者，針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運用「民族主義」不同的功能類型，以達鼓吹、激發愛國情志，或是建立新國家的概念，甚或以為「民族主義」是舊時宗法社會的代名詞等等。最後，歸納「民族主義」一詞，討論其亦影響近代中國「國家」觀念與認同的形成，並完成了具「現代性」的轉化。

關鍵詞：民族主義、種族認同、國家認同、民族帝國主義

* 本項研究資料取自於「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臺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辦公室提供檢索服務，謹致謝意。目前正由兩校共同完善、開發數據庫。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斧正，筆者深感受益，謹致謝忱。

** 作者現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現任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專任講師。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Word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1901-1935)

Hu Wan-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word “nationalism” in by searching the database of “Idea History” and analyzing how many times the word “nationalism” appears in 1901-1935. This study focuses 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history of word meaning and definition with theme. It will discuss how newspapers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introduces Western notion of “nationalism.” It will also examines how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various functions of “nationalism” to encourage national sentiments, establish the idea of “new nation” and equate “nationalism” as the substitute of patriarchal society in the past. Finally, it discusses how the word “nationalism” influences China’s notion of 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comple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Keywords: nationalism,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imperialism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一詞的興起與演變

——以1901至1935年為限

胡 婉 庭

一、前言

在近代波濤洶湧的歷史洪流裡，「民族主義」一詞，幾乎是眾人耳熟能詳的一句流行語彙。但「民族主義」一詞，並不源於中國，而是源於西方，英文原名是“Nationalism”，當代也有人譯為「國族主義」。不管是「民族主義」，抑是「國族主義」，大家或許有同樣的疑問，那就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如何興起的？也就是說，它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接引了十九世紀已遍地開花的西方「民族主義」種子？而來到中國之後，它又是如何被重視與大量運用？此外，「民族主義」一詞在進入中國之後，在不同的文本脈絡中，又是如何的被解讀與詮釋？它的定義為何？隨著當時中國處於劇烈變動的歷史過程中，又如何造成「民族主義」一詞觀念上的轉變？

循上述的問題意識，本文欲將討論的重點，先聚焦在清末的報刊文獻上，也就是以當時最早引進西方「民族主義」一詞的篇章，它是如何介紹西方的「民族主義」，包括從歷史背景，及語意溯源、定義主旨等三方面來探討；接下來，針對中國式的「民族主義」，當時的

知識分子是如何藉由它來達到鼓吹民智、激發愛國情操的精神，或是運用它以建構新的「國家」概念，還是以爲「民族主義」是舊時宗法社會的代名詞，更言執「民族主義」以排外，是不可能救亡的反向論述等等。最後，綜合上述探討，提出現象觀察外，也嘗試反思觀念與事件互動的關係。

關於研究「民族主義」相關論文，據筆者搜尋臺灣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¹，以論文名稱有「民族主義」的關鍵詞查詢，即有100筆之多的論文數量，研究群以三民主義研究所、政治研究所居多，次則爲歷史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另外，臺灣國家圖書館「期刊論文索引」系統²，也有300筆的單篇文章，單本書目也不勝枚舉，可見「民族主義」之研究在臺灣的興盛程度，但其關於談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發展爲主的相關篇章並不多見，與本文論題最爲接近的篇章是沈松僑所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³一文，沈氏於文中根據外國學者 James Townsend

¹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臺灣國家圖書館建置，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web.cgi/ccd=kMoxNz/webmge?Geticket=1>，檢索日期：2010年11月15日。

²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臺灣國家圖書館建置，網址：<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檢索日期：2010年11月15日。

³ 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2002年12月），頁49-119。此外，相關篇章亦有如瞿立鶴：〈近百年中國民族主義教育思想之起源〉，《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8編；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英〕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黃綉媛：〈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救亡運動的四重奏——保國、保種、保教與國粹保存運動的齊鳴（1842-1912）〉，《白沙人文社會學報》第1期（2002年10月），頁317-378；黃興濤：〈情感「思想與運動」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研究檢視〉，《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鄭大華、鄒小站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與 Partha Chatterjee 的說法，將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實踐及擴展程度，區分為「啟航期」（1895-1918）、「操演期」（1919-1949）、「著陸期」（1949-）等三個階段，內容立論明確，且分析透徹，然因其說法較具思想史的性質，所以無法具體地呈現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細部發展的另一個面向。因此，本文擬從考證「民族主義」一詞輸入中國最早的文獻記載，及該作者（指梁啟超（1873-1929））如何介紹這個新名詞，包括定義與價值功能性的論述入手；再者，分析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理解與運用「民族主義」一詞；最後，歸納「民族主義」一詞，討論其影響了近代中國「國家」概念與認同的形成，並完成了具「現代性」的轉化。

而藉由「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⁴ 搜尋的「民族主義」辭彙1,000多條，也是輔助本文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民族主義」一詞，雖說源於西方，但實際應用於近代中國，它不只是近現代中國曾經出現響亮的歷史「口號」而已，而是曾經植入在中國人內心深處，一個面對內憂外患，努力而快速地讓「中國」這個國家形成自我認同理念，與團結禦侮的最佳利器。

此外，因為本文要處理的問題頗為龐雜，礙於學力與時間的關係，本文僅是初步探討，乃就「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中所呈現的現象上，先作描述與整理工作，並簡要分析，期待日後能再更進一步地作完整而深入的研究。

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一詞的興起

自1895甲午戰敗之役，清廷慘遭敗北，中國面臨外強瓜分領土的危機，幾十年的練兵與製造洋械的「自強運動」，一夕之間付諸東流，一向以天朝自居的大清帝國也覺得顏面盡失，面對如此窘境除

⁴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檢索日期：2010年11月6日。

了皇帝之外，在朝為官的士紳階級們也首次感受到強烈的憂患意識，1901年梁啟超於〈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即言：「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⁵ 據「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顯示，此為最早的「民族主義」一詞的出現證明，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是在西方早已完成民族主義建國事業後，繼而發展至帝國主義的強大壓境之下，纔迫使中國開始思考「民族國家」的議題，梁氏並在此文中表達對「民族主義」極為推崇之意，其曰：

凡百年來種種之壯劇，豈有他哉？亦由民族主義磅礴沖激於人人之胸中，寧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於異種人壓制之下，英雄哉，當如是也。國民哉，當如是也。今日之歐洲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義之賜，讀十九世紀史，而知發明此思想功不在禹下也。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⁶

由上述，可知梁氏此時對「民族主義」一詞的初步理解，乃是藉由西方以民族主義團結其民族，齊心共建一民族國家的立場言之，反觀中國，卻一直停留於專制政體或傳統「天下」觀的概念之下，梁氏一方面以其「新民叢報體」的寫作魔力，大力提倡「民族主義」的正面功能；另一方面，也開啟建設新「國家」的觀念。梁氏對國家的定義是：「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⁷ 這裡很清楚地提及了「現代性」其中之一的概念——契約關係，但梁氏順此也

⁵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梁啟超全集》之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458。

⁶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頁459。

⁷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頁458。

對「民族主義」一詞解讀，謂：「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⁸梁氏此番話，既是對「民族主義」以「民」為主的概念說之，另一方面又感於其弊端，衍生出「無政府主義」及具侵略性的「民族帝國主義」，故曰：「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略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⁹可見梁氏積極地倡導民族主義的原因。蓋「民族主義」一詞在當時梁氏的心中，有幾個特點，分述如下：1. 凝聚民心之動力；2. 界定一國的獨立與自由；3. 是近代建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4. 抵抗西方「帝國主義」來侵的愛國精神。

此外，在《清議報》上所刊載的〈帝國主義〉一文，內容敘及「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其謂：

吾人請更論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關係。歷史家之論曰：「封建制度，不拘人種之異同，可隨意劃地而分領，同民族而有異邦之人，異民族而有同邦之人，胡漢吳越，可得雜居。自封建之制既壞，各民族漸覺種族之界限，同族則相吸集，異族則相反撥。民族主義，遂為人類之一大理想。……」然吾人之所見，則國民造成之動力，非同民族之吸集力而已。此外更有異民族同化力，即強力民族，同化弱力民族，而抹殺其界限之力也。……固因民族膨脹，吸集同民族之效力，其外或買收或併吞外國之領土，有同化異民族之力，故至此也。¹⁰

由上述，可知「帝國主義」乃為「民族主義」的膨脹所致，也就是說原本的「民族主義」是同族相吸，異族相斥的，也有「種族界限」的概念，但「帝國主義」則除了同族相吸的原本想法之外，還有同化異族的事業，這樣一來，面臨西方「帝國主義」有可能以「同化異族」

⁸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頁458。

⁹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頁460。

¹⁰ 梁啟超：〈帝國主義〉，《清議報》第97冊，1901年11月11日。

的方法，來對付積弱不振的清廷時，一群關切國家存亡的知識分子，他們擔心的當然就不僅僅是被外國所欺侮、割地、賠款等等的外部問題而已，還有發自內部而孕育出的強烈「救國保種」的憂患意識，惟其要「救國」，要建設一新國家，需要「民族主義」；惟其要「保種」，要有種族認同意識，也同樣需要「民族主義」，因此，「民族主義」一詞的多重功能之複雜性，於焉興起與開展。

然而，梁啟超於1901年，將「民族主義」一詞第一次引進中國，不僅僅是希冀中國可以學習西方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面，他也同樣地擔憂西方「帝國主義」會隨即侵略中國，因此，「民族主義」一詞，形成了另一形式的愛國主義，也成為團結內部各民族，以抵禦外強的最佳利器。但是梁氏這番「美意」，卻在接下來的歷史事件變化中，產生了相當大的歧異點，換言之，「民族主義」一詞的內容，並非誠如梁氏以建立現代國家為主的一貫性意涵，而是在中國內部開始發酵出幾個問題：一是如何界定「民族」一詞的內容，引發的是以排滿為主的「種族認同」民族主義，及主張以歷史文化為主的「文化認同」民族主義；二是對「民族主義」的功能性產生質疑，也就是說，「民族主義」一詞，不是全面的正面肯定價值，也有負面否定的價值觀點，如嚴復（1854-1921）在1904年〈讀新譯甄克思《社會通詮》〉一文中就說：「總之，五十年以往，吾中國社會之前途，雖有聖者，殆不敢豫；而所可知者，使中國必出以與天下爭衡，將必脫其宗法之故而後可。……彼徒執民族主義，而昌言排外者，斷斷乎不足以救亡也。」¹¹ 嚴復在這裡把「民族主義」與「宗法社會」意涵等同，他所謂的「宗法社會」，簡言之，就是專制政體，¹² 他認為

¹¹ 嚴復：〈讀新譯甄克思《社會通詮》〉，《嚴復集》第1冊，頁146。

¹² 「凡專制治體，未有不沿宗法之舊者。故張橫渠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中國而外，如俄羅斯，其紮爾於其種族例為族長，於其宗教例為朴伯譯言法王。突厥之沙爾丹亦然，皆其證也。蓋天王一人之身，實兼天、地、君、親、師五者。方社會幼稚，勢若必此而後安。特其制既成之後，又常至堅難變，觀於巴爾幹半島之事可以見矣。……夫民族主義非他，宗

唯有脫離傳統儒家所建立的政治道德綱常體系，並提出「救貧」方案，中國才能真正建立一個與西方等同的新「國家」。

三、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一詞的演變

雖然梁啟超開啟了「民族主義」進入中國的論述，但「民族主義」一詞所包含的內容，卻充滿了複雜的功能性意涵，因此，要將「民族主義」一詞的內涵作一細膩的劃分並不容易，爲了突顯其各有偏重的功能性意義，筆者試圖區分爲七大類型，如下：1. 種族認同；2. 建立現代國家；3. 激發愛國熱忱；4. 民族帝國主義；5. 文化認同；6. 馬列主義對民族主義的評論；7. 談民族主義的形態，並根據「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中「民族主義」1,000多筆詞條中，觀察及分析了1901-1911年及1912-1935年中的「民族主義」一詞。¹³ 首先，製作「民族主義」一詞的功能類型例句，爲表格（表一），再者，以功能分類所出現的次數，做成表格（表二、三）的統計資料，最後，另製作一圖表（圖一、二），以方便讀者一覽各類型「民族主義」的曲線圖。以下將就做成的表圖，來進行分析工作。

法社會之真面目也。」嚴復：〈讀新譯甄克思《社會通詮》〉，頁146。

¹³ 以1911年作爲劃分的點，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後的「民族主義」一詞功能類型有著顯著的改變，變異的原因除了不再以種族排滿革命爲爭論焦點之外，此時歷史事件的發生重心，「民族主義」一詞並無需被派上用場，直至孫中山先生1924年的「聯俄容共」後，始有爭論，而爭論的焦點，在於質疑一是國民黨「民族主義」是否真可建立現代國家；二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本是不同的。

表一：「民族主義」一詞的功能類型及例句舉隅

功能類型	例句	作者及出處
1. 種族認同	1-1. 「民族主義，國民主義者。吾不知其所下定義如何，以簡單的推定之，則民族主義，謂排異族；國民主義，謂排專制也。」 1-2. 「夫國民主義，從政治上之觀念而發生；民族主義，從種族上之觀念而發生，二者固相密接，而決非同物。」	1-1. 梁啟超：〈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飲冰室文集》之十八，1905年。 1-2.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未完）〉，《民報》第1號，1905年11月26日。
2. 建立現代國家	2-1. 「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 2-2. 「在民族主義立國之今日，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殆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2-1.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文集》之六，1901年。 2-2. 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專集》之四，1902年。
3. 激發愛國熱忱	3-1. 「故敬禮崇拜世界民族主義之巨人，先宜敬禮崇拜中國數千年民族主義之第一人，為種魂，為國魂，為中國民族之天神。」 3-2. 「我中原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耶？壯哉！我民族主義之英雄，雖為囚虜，而能不伏拜於老上之廷，完全我大國民之資格？」	3-1. 〈中國民族主義第一人岳飛傳〉，《湖北學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3-2. 荊駝：〈中國民族主義大豪傑冉閔傳〉，《江蘇》第11、12期，1904年5月15日。

<p>4. 民族帝國主義</p>	<p>4-1. 「蓋莫不經過民族建國之階級，其現世實行之帝國侵略主義，實乃其民族主義之發洩耳。」 4-2. 「故今之世界，又一強權干涉之世界也。屬者民族主義日膨脹，殖民政略益發達，歐狼美虎，擴張強權。」</p>	<p>4-1. 漢駒：〈新政府之建設〉，《江蘇》第5期，1903年8月23日。 4-2. 留學日本明治大學高等研究科生法學士通州陳彥彬：〈釋國際法上干涉之範圍〉，《外交報》第270期，1910年3月25日。</p>
<p>5. 文化認同</p>	<p>5-1. 「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 5-2. 「孔子作春秋，最嚴夷夏之界。經傳每及夷夏，爲此滋懼。民族主義之最著者也，大地無論何國何教何學，其重民族自古矣，未有自夷其民族而能謂之爲人也。」</p>	<p>5-1. 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專集》之四，1902年。 5-2. 〈哲學叢談〉，《遊學譯編》第9冊，1903年8月7日。</p>
<p>6. 馬列主義對民族主義的評論</p>	<p>6-1. 「半殖民地諸國（如中國，波斯）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與一帝國主義國家，或數帝國主義國家相結合，其危險已至。」 6-2. 「資產階級所謂民族主義，即帝國主義之工具，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民族主義乃是弱小民族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者的意義。」</p>	<p>6-1. 一鴻譯：〈東方問題之題要：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通過〉，《新青年》第10卷，1923年6月15日。 6-2. 獨秀（陳獨秀）著：〈歐戰十周紀念之感想〉，《嚮導》第78期，1924年8月13日。</p>

7. 談民族主義的形態	<p>7-1. 「由是聯合主義弛，而分立主義張；大民族主義消，而小民族主義長，至是遂無，復有實現大斯拉夫聯邦之希望。」</p> <p>7-2. 「這謙遜的真正的愛，斷然不是一階級一族一國一群的所謂救主的所能有的。這樣的救主，無論他稱作社會黨、民族主義者、大日爾曼主義者、大斯拉夫主義者、猶太主義者，他們對於個人的受苦不甚關心，只夢想著無量數人的幸福安危。」</p>	<p>7-1. 范石渠：〈近世民族主義之爭鬥（譯新日本雜誌）〉（續），《大中華》第1卷第4期，1915年4月20日。</p> <p>7-2. （英）Angelo S. Rappor 著，起明（周作人）譯：〈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下），《新青年》第6卷第5期，1919年5月15日。</p>
-------------	--	---

（一）1901-1911 年

首先，我們發現第二種類型——「建立現代國家」，乃是1901年「民族主義」一詞輸入中國最多人使用的功能性定義，1902年承繼前人說法，至1903年達到最高峰，且在1903年，也是研究年限（1901-1911）內，出現「民族主義」一詞總數最多的一年，共計263筆，為什麼1903年會暴增對「民族主義」一詞的使用呢？從 Ernest P. Young 所寫的〈廿世紀初期的中國：民族主義、改革與共和革命〉一文中，概述了清廷官方教育改革的時代背景，他說：

科舉制度的廢除所帶來真正革命性的改變是在政治態度和價值觀兩方面。……清廷現在所需求的是西方的特別技能和智識，而理由很明顯：只有具有這些能力的民族才能應付帝國主義的威脅。千百年來佔著地位的儒雅人士已經被認為是過時了。現在，兒童必須學習數學、地理、科學，和最重要的民族主義。在一九〇三年和一九〇六年出版的新學制教科書都強調中國在十九世紀所喪失的領土，不平等條約，教士在內地的橫行無

忌，庚子拳變的羞辱，種族衝突和競爭的重要，以及尚武精神。¹⁴

Ernest P. Young 指出這是二十世紀初，最被人忽略的官方帶頭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科舉的廢除，新式教育的成立，與新學制的教科書，又計畫性的以公費幫助留學生出國念書等等事宜，造就新思想、新觀念的知識分子，無疑地是被期許能輔助清廷的施政，但萬萬沒想到原本尋求百姓支持的官方，卻意外地培育了人民知識的普及化，而私人團體各自成立，報紙、刊物等大眾媒介的發行，也隨之應運而生，民族主義的愛國理念，不只在官方的教科書中特別強調，亦在各報章雜誌上隨處可見，如章太炎（1869-1936）於〈駁革命駁議〉一文中，說：「無掀天揭地之革命軍，則民族主義不伸。民族主義不伸，而欲吾四萬萬同胞，一其耳目，齊其手足，群其心力，以與眈眈列強競爭於二十世紀之大舞臺，吾未聞舉國以從也。」¹⁵ 又蛻庵於〈鐵血宰相俾斯麥傳〉中也言：「激以國仇之未報，國恥之未雪。且屢以民族主義，激厲其愛國之心，於是普人敵愾之憤氣，排外之熱度，火炎電激。」¹⁶ 上引兩則，皆是上表歸類於「民族主義」第三種「激發愛國熱忱」功能中，最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在1903年中，最具分量的依然是梁啟超的論說，其在〈政治學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裡，其據德國學者伯倫知理反駁盧梭民約說為始，以發展其建構「國家」的理論。伯倫知理認為盧梭《民約論》的說法，充其量只是國民於社會中的活動，但國家中的人民則不同，他認為國民者必須有三種性質：1. 要建立一長久永續的國家，

¹⁴ Ernest P. Young 著，甘德星譯：〈廿世紀初期的中國：民族主義、改革與共和革命〉，收於李國祁等著，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頁54。

¹⁵ 章太炎：〈駁革命駁議〉（1903年6月12、13日），收於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上冊，頁231。

¹⁶ 蛻庵：〈鐵血宰相俾斯麥傳〉，《新民叢報》第34號，1903年6月24日，頁47。

必有同心合德之國民；2. 其國民必皆立於平等之地位；3. 其國民必須全數服從。由此看來，梁啟超引伯氏之說，無非是基於建設一個強盛的國家言之，他認為唯有國家的統一與有力之秩序。再者，鑄部民使成爲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梁啟超接下來又再介紹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說，意指一個國家，並不僅僅是毫無根據的聚眾爲國民，也不是只有冷冰冰的契約法律制度，而是它必然是通過眾人的意志及建構出來的精神象徵，並加以行動，即爲「國家有機體」。此外，梁氏對伯倫知理的說法有感，也指出當時許多愛國之志所志，果真是以排滿爲目的的話，那麼，他們排滿的目的何在？梁氏云：

今日之中國，實非貴族政體，而爲獨裁政體，其蠹國殃民者，非芸芸坐食之滿人，而其大多數乃在閹媵無恥媚茲一人之漢族也。……故今日當以集全國之鋒刃向於惡政府爲第一義，而排滿不過其戰術之一支線。……默察兩年來世論之趨向，殆由建國主義一變而爲復仇主義。¹⁷

上述梁氏將問題直指獨裁專制、腐敗無能的清廷政府。是清廷，才是大家要「革命」的目標，而非構築於是滿、漢人種爭論問題上，否則當時的輿論，只是「由建國主義一變而爲復仇主義」而已。另一方面，梁氏亦有「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之主張，他說：

則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¹⁸

梁氏如此區分「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乃是針對當時排滿人士言之，他希望是以「大民族主義」融合國內諸民族成爲一強而有力

¹⁷ 梁啟超：〈政治學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收於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之一，頁453-454。

¹⁸ 梁啟超：〈政治學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頁454。

的國家，亦是指以語言、文字、風俗等為主的「文化認同」之民族主義。因此，梁氏的「民族主義」，並沒有排滿的問題，但卻因為其厭惡排滿，遂造成日後與人爭辯的焦點。

觀梁啟超一開始介紹「民族主義」兩條主軸，一是以民族文化凝聚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二是以建構「國家」主體為重點的「民族主義」，為日後與時人的論戰，再以「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劃分開來，梁氏說：「民族主義國民主義者，吾不知其所下定義如何，以簡單的推定之，則民族主義，謂排異族；國民主義，謂排專制也。」¹⁹ 這樣截然區分排異族、排專制的兩個系統，形成1905年延續至1907年的討論風潮。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地觀察梁啟超為什麼要如此劃分「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其實重點是放在「民族主義」功能評論上，換句話說，梁氏要說明民族主義並非國家成立維持的必要，但國民主義卻是國家成立的必要條件，而愛國心的問題，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都有相關，但僅談民族主義，卻很有可能不懂什麼是愛國、如何愛國等等，梁氏認為「民族主義所以能與愛國心相聯屬者，乃僅在依賴國民主義以為之媒介，則其與愛國心無原因結果之關係甚明。」²⁰ 如此看來，「民族主義」＝「排異族」的功能性價值，對於建構或維繫一個國家的立場已然被梁啟超排除在必要的條件之外，因此，他又說：

夫國民主義，則政治革命論之立腳點也；民族主義，則種族革命論之立腳點也。吾認國民主義為國家成立維持之必要，故主張政治革命論；吾認民族主義為國家成立維持之不必要，故排斥種族革命論。吾以為若從國家之成立維持一問題著想，則民族主義，贅疣已耳。²¹

¹⁹ 梁啟超：〈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收於《飲冰室文集》之十八，頁47。

²⁰ 梁啟超：〈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頁47。

²¹ 梁啟超：〈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頁47。

梁氏堅信只要持「國民主義」，則為國家成立之唯一必要條件，也就是政治革命論之立基根本，相對於「民族主義」，只不過是累贅而已。蓋梁氏本欲消弭排滿人士的「種族」民族主義觀點，但一經這麼嚴格的劃分界限，反而引起排滿人士的強烈反彈，又適逢1905年11月26日《民報》於東京創刊，除了宣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革命思想之外，最重要的是對《新民叢報》的「大民族主義」，即「文化民族主義」的諸多論戰，皆在《民報》上陸續刊載，姑且舉汪精衛（1883-1944）〈民族的國民〉一文為例，他說：

夫國民主義，從政治上之觀念而發生；民族主義，從種族上之觀念而發生，二者固相密接，而決非同物。設如今之政府，為同族之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對之只有唯一之國民主義，踣厥政體，而目的達矣。然今之政府為異族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顛覆專制，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能達，乃國民夢不知覺。²²

汪氏以為中國目前處於異族／滿族的統治之下，民族主義適具有種族認同上的功能性定義，也就是以「驅除異族」為目的，因此，民族主義在當今的中國，乃為必要且根柢的條件，換言之，汪氏等人所在意的是當前乃滿人為君、為臣，佔領整個皇朝的最高層，即使大家有志一同為推翻君主集權的政體，為謀求新的共和國家而努力，但漢人依然受制於滿人，怎麼會有平等可言？且滿人是異族，也是夷狄，汪氏並譏諷梁啟超所謂的「大民族主義」，就像「夢囈」般，汪氏據此進一步地論述，他說：

若如梁氏所云：「謂滿人已化成於漢民俗」，而不悟滿之對我其陰謀詭計為何如，容可謂之知言乎？故吾之言排滿也，非「狹

²²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未完）〉，《民報》第1號，1905年11月26日，頁38。

隘的民族復仇主義」也。勸我民族自審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處也。梁氏而無以難也，則請塞爾口，無取乎取民族主義而詆毀之也。²³

細讀上文，汪氏認為既然國內的他族（指滿人）已被漢族同化已久，應當由漢人來復興中原，取得主導權，方能有能力同化他族才是，也就是說，汪氏並不認同所謂的「排滿」即為梁氏言「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反而汪氏以為種族的融合與同化事業，必以先排滿為前提，沒有排滿，遑論建設新國家、新政府、新制度，並非僅僅只是梁氏倡言「國民主義」或「政治革命」可以完成之事，且這在之前必須先實行「種族革命」，輔之倡導以種族認同的「民族主義」，激發國人的愛國情操，這是《民報》這一派人士所堅持主張的論點。

綜上所述，從1901年至1911年所產生的「民族主義」一詞的變化，由圖一可以很清楚的觀察出從1908年之後，「民族主義」一詞又急遽地下降，這很有可能是隨著《新民叢報》於1907年11月的停刊，《民報》人士沒有對手可打筆戰，也許還有其他的原因，目前尚未作進一步的探究，但至少從1905年至1907年，歷時三年的「民族主義」戰火，隨之也緩和了下來。

（二）1912-1935年

自1911年以後，中華民國成立，不再是以排漢或排滿「種族認同」之民族主義為問題，代之而起的是政黨參政，制定國家議會章程，探索內閣組成及相關關係的開始，而陸續黨爭、二次革命、洪憲帝制、張勳復辟等等事件的出現，與民初共和政體的嘗試失敗有著相當大的關聯性，但這些歷史事實的發生背後原因，其關鍵的辭彙，似乎與吾人所設定的「民族主義」功能類型無多大的相關性，其關

²³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未完）〉，頁42。

鍵詞本身應是聚焦在「共和」、「民主」、「科學」等詞的身上。而就1912年以後至1922年間，當時歷史事件所呈現出來的大多集中在中國的內部體制改革中，一路走來搖搖晃晃的「共和」體制，不是發動帝制，就是軍閥割據，因此，提及「民族主義」，不乏有人認為中國必須持續為「建立現代國家」而努力，也試圖泯除辛亥革命前激烈的「種族認同」爭論問題。²⁴然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陸續也出現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相關時事評論，內容大多數集中於「民族帝國主義」功能類型的詞義，此時，呈現對「民族主義」的負面觀感開始佔多數的比例。首先，有些人認為是「民族主義」的強烈種族排外情感，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如范石渠於〈近世民族主義之爭鬥〉一文中，謂：「他如亞伊斯郎德之背丹麥，愛爾蘭之欲離英吉利而獨立。又如亞美尼人之陰謀、巴爾幹諸邦之紛擾，亦無非出於民族主義而已，予今殊不暇一一及之。」²⁵並在其續文中，再言：「而土耳其政策，縱不能歸於失敗。蓋他民族見其施設，無不駭然以驚惶然而懼，雖欲平和解決，而為民族主義所激動，不得不訴諸武力，以競生存。戰釁一開，風雲變色。土耳其民族，至被逐於默李士亞河以東，籲可畏哉。」²⁶以上可見范氏對「民族主義」一詞的看法，儼然是一

²⁴ 如吳貫因（1879-1936）於〈五族同化論〉一文中，言：「則以今日，已非宗法之社會，而為軍國之社會。欲富強其國，當對外而為國民之競爭，不可對內而為種族之競爭。故歐美列強，其國中雖尚存有某某種族之名，然其界限已漸消滅，有終歸於同化而已矣。……夫滿蒙回藏諸族之中，既各含有漢族之分子，然則此四族者，不惟以國家主義論之，不能離漢族而獨立；即以民族主義論之，亦不能離漢族而獨立，蓋其中既含有漢種在，則今之昌言反抗共和，欲離漢人而獨立者，安知彼其祖宗，非即漢人也？故就此點而論，滿蒙回藏諸族，又宜與漢族同化，而萬無可存畛域之理由也。」吳氏雖倡言五族同化，但如果深入探究，其依然不離以漢族為中心的論述思維。參見吳貫因：〈五族同化論〉，《庸言》第1卷第7號、第1卷第8號，分別刊載於1913年3月1日、1913年3月16日，頁1130、1307。

²⁵ 范石渠（生卒年不詳）：〈近世民族主義之爭鬥（譯新日本雜誌）〉（續），《大中華》第1卷第3期，1915年3月20日，頁554。

²⁶ 范石渠：〈近世民族主義之爭鬥（譯新日本雜誌）〉（續），《大中華》第1卷第4期，1915年4月20日，頁770。

顆煽惑國際戰亂的種子，及禍患的根源。他又說：

此兩次戰役，雖各不同，而一為推測其由來，則皆出乎民族主義而已。……大民族主義消，而小民族主義長。……然局勢一變，最近忽有頗斯尼亞及塞爾維亞人暗殺奧國太子之事。此其民族主義究竟若何，是又不得不一述大塞爾維亞主義矣。而欲述大塞爾維亞主義，即又不得不先言泛斯拉夫主義與斯拉夫民族運動，以及奧大利對此之關係。……德意志亦助其同民族之奧大利，以興師而動，眾此直可謂為日爾曼民族對斯拉夫民族之戰也。要之民族主義，實現世政治上不可輕視之一大事實。弱者由此而獲得自治或獨立，強者由此而開拓國運，膨脹領土，殆無論何人均不得而河漢斯言也。²⁷

范氏在此引梁啟超曾言的「大民族主義」與「小民族主義」之消長狀況，來說明兩次巴爾幹戰爭事件的最根本原因，即是種族認同的「小民族主義」在作祟，畢竟在巴爾幹半島上，要分辨出那一類種族，是頗為複雜的一件事，惟其種族多，要各自獨立成爲一個個國家並不容易，此外，之後有所謂「泛日爾曼主義」與「泛斯拉夫主義」幕後帝國主義的黑手，欲擴張自己國家的領土，遂將勢力延伸至巴爾幹半島，戰爭的導火線於焉展開。因此，范氏直言民族主義爲「現世政治上不可輕視之一大事實」，可見對民族主義「認同」的觀點，不管是種族上的認同，抑或是民族帝國主義式的勢力擴張，皆會直接造成政治實踐的影響力，並與建立現代國家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

另一方面，觀化在〈論歐戰原於經濟之理由〉一文中，乃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之，他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問題，因爲市場經濟會直接導入商品行銷至全世界的欲望，而商品的需求一旦增加，原料市場也勢必擴展，在原有領土的狹小範圍內，各個有勢力

²⁷ 范石渠：〈近世民族主義之爭鬥（譯新日本雜誌）〉（續），頁770-2。

的國家便尋求往外拓殖領土。因此，在歐洲，「民族主義」早期的功能任務是建立獨立的現代化國家，但接下來，即進入擴張的經濟市場，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產生衝突的「新要素」。²⁸ 觀化的說法，與日後以「唯物」史觀為主的馬列思想，有著一脈相承的概念，也就是說，歷史是由物質發展構建的現象，而經濟與國家政治卻一直是保持互相依賴的關係，如果國家經濟一旦失衡、崩解，即會導致社會的動盪不安；此外，主導著社會、國家直線發展的「進化」史觀，更是直接引發民族國家向外擴張及戰爭的背後關鍵思維模式，因為自由的貿易市場，是以全世界為舞臺的，經過自由競爭的結果，容易產生強者益強，弱者益弱的民族國家，因此，弱肉強食的現象，及衍生出民族國家間不平等的對立紛爭，便在二十世紀初真實上演了一幕幕的國際戰爭，所以，針對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總總弊端，形成社會主義、馬列共產主義趁勢興起於中國知識界，這股暗流，夾雜著陸續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1919年中國對巴黎和會的美夢破碎，因而激起了「五四」愛國遊行運動，但僅僅只是一場純粹的學生示威遊行的運動，為什麼會接下來引發一場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呢？這當然不是簡單的幾個支脈可以說清楚的事，但就知識分子而言，他們覺悟到的是要更多與民眾的接觸，走向民間、啟發民智與組織民眾，也為新文化運動帶來廣遠的傳播力。

然而，巴黎和會的不平等條款，讓中國人感受到空前的屈辱，新仇再加上舊恨，包含了過去列強侵略中國的過往記憶，再加上了當時國內軍閥割據的紛亂局面，共和政體的諸多缺失，「民族主義」一

²⁸ 觀化云：「使不佞所讀之歷史，果無謬誤，則凡古今來政治團體衝突之主要原因，要不外發達各團體之經濟條件而已。……及進第二階級，則所以為政治膨脹之經濟的理由者，更在望其團體生產力之發達。……自近世民族主義既確立後，始有從來政治團體爭鬥時不經見之一種要素發生，要素維何，即入此時期後，於從來重視之原料供給殖民地外，更注重工業品之販路是也，近今國家間之衝突，此實為經濟的之一新要素。」見觀化（生卒年不詳）：〈論歐戰原於經濟之理由（譯日本經濟論叢）〉，《大中華》第2卷第7期，1916年7月20日，頁1631-1632。

詞，就愈趨負面的評價，如錢玄同（1887-1939）就曾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大家對於紀年的問題皆有著紛歧意見的同時，提出了他個人的看法，他說：「我對於以上各種新紀年的意見，只有那孔子黃帝兩種含有特別作用，不能贊成他，——因為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孔教，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主張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²⁹此時無論是以種族或文化認同的「民族主義」一詞，皆被錢氏視為「狹隘」的功能類型，可見「民族主義」一詞至此是極為負面性的評價功能，此外，在張崧年翻譯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的〈民主與革命〉一文中，羅素則大力地提倡社會主義，貶抑資本主義下的政治、社會，他說：

除美國外，還有一種強大的民眾勢力，和世界的社會主義反對，這就是民族主義之勢力。民族主義的意義，就是不管人家怎樣只圖己國利益的一種決心，就是相信利害不同的民族本來是不相容的，或者仇怨他種民族更以為這種信念是一個合理的表示。在和約造成的各新國中，這種民族主義大概絕對佔有勢力。有許多國家情願忍著饑餓去屠殺鄰人，卻不願意和他們所仇視的鄰國照友誼的關係過太平日子。……在現在世界各種勢力當中，只有世界的社會主義，才真能把人民好戰的心理完全改變。³⁰

照上文所示，羅素對「民族主義」的定義，乃是針對「民族帝國主義」的功能類型言之，「民族主義」一詞，在羅素看來僅僅是「圖己國利益」、「仇怨他種民族」的功能性理念，於此是幾近等同於「帝國主義」一詞的內容，且羅素又進一步分析，認為「民族主義」是幫助

²⁹ 錢玄同：〈論中國當用世界西曆紀年〉，《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年11月1日。

³⁰ [英]羅素著，張崧年（張申府）譯：〈民主與革命〉，《新青年》第8卷第3期，1920年11月1日。

「國家主義」、「資本主義」作惡的內在趨力，³¹因此，推論結果，務必與上述這些主義作一番的切割，鼓吹向「社會主義」靠攏，才能使最大多數民眾得到物質的幸福。

根據周策縱（1916-2007）《五四運動史》所記載，一位北大學生追憶「五四」前幾天學生們騷動的情緒，一一地表露出大家對於西方列強的憤怒與失望，³²學生們及群眾如此相信「巴黎和會」會帶來中國新的氣象與公平合理的對待的同時，卻得到的是正相反的回應，這樣巨大的反差，遂引發「五四」示威遊行的運動，但這樣的歷史事件，誠為周策縱所言：「『五四事件』之所以能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毋寧說是因為遊行示威所引起的這些後果，而不單是因為遊行示威的本身。」³³由一群北大學生所發起的愛國運動，迅速地連繫了新知識分子，他們開始注意到民眾的觀感，因之推行白話文運動，宣傳新思想的刊物也如雨後春筍般的發達起來。³⁴此外，隨

³¹ 「要是大家都了解由經濟的掠奪流出之罪惡，大家都希望把這種罪惡完全消滅，好另建一個新世界，那時一定有一種新勢力生出來，把深入人心的民族主義盡情拔去，現在歐洲及亞洲，只有那國家主義幫同資本主義作惡，一旦國家主義除去，理想和自利會同時喚起世界多數文明的人採用世界的社會主義。」〔英〕羅素著，張崧年（張申府）譯：〈民主與革命〉，1920年11月1日。

³² 當時的北大學生一說：「巴黎和會的消息最後傳到這裡時，我們都感到非常震驚，我們立刻對事實的真像覺醒了，外國仍然是自私和軍國主義的，並且都是大騙子。」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sch，1869-1923）「描述『五四』前夕中國人民和在中國的美、英人士的情緒如下：『世界上可能沒有任何地方像中國這樣對美國在巴黎的領導抱著如此大的希望。中國人信任美國，信任威爾遜總統時常宣佈過的原則，他的話語傳播到中國最遠的地方。正因為如此，那些控制巴黎和會的老頭們的決定，使中國人民有著更強烈的失望和驚醒。』」周策縱：《五四運動史》（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上冊，頁172。

³³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冊，頁211。

³⁴ 「五四以前，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報刊只有《新青年》、《每周評論》等為數不多的幾種，五四運動後的一年裡，傳播新思潮的進步社團和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青年們對報刊宣傳作用的認識所產生的結果。據不完全統計，這一階段新出版的革命學生刊物達400多種。」方曉虹：《中國新聞史》（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著「巴黎和會」對中國青島領土的裁決結果，中國人除了情緒上的憤憤不平之外，適逢俄國於1917年的十月革命成功，1919年3月在列寧的指導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成立，爲了擴展及全世界的國際性無產階級組織，他們很快地找到東方各國，那曾經或目前正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與宰制的民族國家，並進行意識形態上的灌輸新思想活動，中國即是一例，在《新青年》上刊載的〈東方問題之題要：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通過〉一文中，謂：

大多數東方國家裡，（印度，波斯，埃及，敘利亞，美索波達美亞），農民問題確是反抗列強專制之解放運動中之第一最重要的問題。帝國主義既剝削落後民族之大多數的農民而今破產，自然使農民喪失其必要的生活費，……於是此等農民乃窮乏不堪，留在鄉間反變成農奴。……只有農民革命，以「沒收大地主」爲宗旨者，方能引起大多數的農民群眾而與反對帝國主義之鬥爭以極大的助力。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派，怕提起農民問題中的標語，（波斯，印度，埃及），足見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或「封建資產階級的」地主有密切的關係，即在政治思想上亦不能離之而獨立。……東方落後國家之革命運動，假使不能以大多數農民群眾之行動爲根據，決不能有成功。³⁵

此段引文，雖說明了共產國際階級鬥爭的手段及意義，但也確實道出西方民族國家，無法想像的東方廣大農民、勞工一直處於被壓迫與剝削的角色，而資本主義最大的進化動力，也是一種弊病，即在於相當符合「物競天擇」說，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狀況如果一直不斷地成長下去，那麼，社會必然會形成動盪的局面，如果沒有適當的

年），頁137。

³⁵ 一鴻（此係筆名，本名與生卒年不詳）譯：〈東方問題之題要：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通過〉，《新青年》第10卷第1期，1923年6月15日。

改革方案，「革命」勢必在所難免，這即是中國新知識分子及民眾，在接下來的歷史活動中，大大地接受共產主義理念的根源之一。

然而，「民族主義」一詞的內涵，本身即包含了國家與人民組成關係的定義，因此，在1912年至1922這段時間中，我們可以了解當時中國一方面對「共和」體制摸索失敗；另一方面也體現此時中國的動亂之象，不啻可視為整合內部勢力，並建立現代憲政國家的初步實施。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4年，孫中山先生為了擴大國民黨的勢力及與俄國表達互助友好的關係之下，採取「聯俄容共」的策略，「民族主義」一詞，頓時再度成為熱門的使用辭彙。為什麼此時的報刊文章又明顯的使用「民族主義」一詞呢？根據「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的資料整理顯示，發現「民族主義」使用功能除了維持集中在「建立現代國家」的常態功能類型上之外，隨之中國共產黨建黨，並宣揚馬列主義，也漸轉而成為馬列主義評論的對象。此時的「民族主義」幾近成為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代名詞，因為西方經過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思潮，建立了新體制的國家，但發展至今，卻是弊端叢生，最大的問題一是從經濟的角度言之，貧富差距日異增多，勞資雙方理念差異也越來越大，且資方又常夾雜著西方強權的入主當家，在多種形式的壓迫下，³⁶ 共產主義提出「階級鬥爭」說，正給予了無產階級「革命」正當性的理由；二是從政治的角度言之，各個民族應有獨立的自主權，自行決定「我們」屬於那一個群體，以便建立新國家，但隨著一些國家經濟勢力的膨脹，變相地為奪取更多的生產資源，遂侵佔或掠奪到別國的領

³⁶ 「政治上的進攻還不足，更加以暴力的行動，實行資本家的政策。義大利的『法塞派』不過是此中的一部分，……（義大利『法塞派』一出於“Fasci di Combattimento”，譯意可為『鬥毆會』，完全是一班退伍軍官，高等下等的流氓光棍，做中堅人物，以盲目的民族主義，侵略主義為宗旨，於罷工時毆殺工人等，聲言所謂『保障國權』）。」瞿秋白（1899-1935）：〈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共產國際之策略問題〉，《新青年》第10卷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土，³⁷此更是共產主義所強烈批判的地方。因此，「共產國際」的誕生，便是以批判資產階級及西方帝國主義的弊病，而興起的一種世界觀，亦即要求民族解放，走向全面性的革命烏托邦世界。

另外，當時另一個重要的本土政黨——中國國民黨，亦在其《三民主義》中，使用了「民族主義」一詞，作為《三民主義》的第一個「主義」，在1924年孫中山（1866-1925）於《嚮導》雜誌上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言：

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復從而包圍，故當時民族主義之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政制政策與列強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後，滿洲之宰制政策，已為國民運動所摧毀，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語變為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奪變為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足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而資產階級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餽餘，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即於憔悴。³⁸

這是國民黨第一次清楚地說明其持主義的意義與目標，並敘述「民族主義」功能的歷史背景，簡單地來說，《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³⁷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看著勞動運動，只當他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國際的無產階級卻注意於東方幼稚勞動運動的『革命的將來』。東方落後國家處於資本主義之下，不出巨大的代價，一即不忍受列強資本家野蠻的剝削壓迫，就決不能獲得近代的文化與技術。……蘇維埃制度是落後諸國從原始的簡單生活進於最高文化共產主義之過渡方法，唯採此制則過渡期間之痛苦最少；可以代替全世界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分配制度者本只有共產主義。」一鴻譯：〈東方問題之題要：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通過〉。

³⁸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嚮導》第53期，1924年2月20日。

其當前目標有二，一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是鏟除國內軍閥割據的局面。但另一方面，此時「民族主義」一詞的定義，除了與當時國家陷於困窘的現況有關之外，也與馬列共產思想有密切的關連性，如陳獨秀（1879-1942）在〈列寧主義與中國民族運動〉一文中，謂：

不脫封建時代思想的民族主義者，即資本主義前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不了解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形式的帝國主義和被他剝削的弱小民族之間的關係，他們不懂得現代的民族運動特性和封建時代的民族運動不同，他們認不清弱小民族之敵人是誰，更認不清弱小民族的友人是誰；因此，他們自以為是民族主義者，實際上他們竟放過了民族運動之敵人，且會和民族運動的敵人妥協，而受敵人的教唆仇視民族運動之友人，……中國不脫封建時代思想的知識階級也是如此。他們當中，或極力主張民族運動（如青年黨），或自以為是民族主義者（如國民黨右派）；然而他們都不贊成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竟不看見剝削壓迫中國民族無所不至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竟不覺得他們自己及自己的民族踐踏在帝國主義者的腳下，反而攻擊同情於中國民族運動的蘇俄是「赤色帝國主義」。……³⁹

這是很典型共產主義式之對「民族主義」的觀點，概括言之，「民族主義」在「共產國際」的意識形態底下，具有以下幾種含意：（一）「民族主義」是屬封建思想的知識階級所擁有；（二）「民族主義」乃最後是與「帝國主義」連結在一起的「民族帝國主義」；（三）許多弱小的國家，被「資本主義帝國」假借「民族主義」之名，而行壓迫與剝削之實。因此，經過「共產主義」全面性地對「民族主義」作一番與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連結等同的改造功能詞義之後，遂能順利地從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到反抗資本主義帝國，又再反對資產階

³⁹ 陳獨秀：〈列寧主義與中國民族運動〉。

級，以準備進行無產階級的鬥爭。

然而，這樣具強烈意識形態的觀點，與當時國民黨的黨綱、精神是截然不同的。國民黨以「三民主義」作為依歸，且認為「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為中國惟一的生路」，⁴⁰且挾「民族主義」謂求國內各民族的解放，並期許與民眾深切結合，欲以此來容納更多共產主義思想的黨員們，如果再進一步分析兩黨的「民族主義」，例如同樣地要求先打倒軍閥，其施行武力的意義就不一樣。首先，國民黨「民族主義」並沒有要做到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而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卻是要求做到全面性的工農等的一律平等階級；再者，國民黨自身即以「三民主義」作為黨明確的貫徹實踐理念，共產黨則是第三國際的支部，其主要理念是推翻資本主義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欲改造為統一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⁴¹但畢竟是受制於蘇聯共產國際，其自身的組織與理念，並不如國民黨來得成熟且確切，僅能以批駁國民黨的方式來突顯其黨政的中心主旨。然而，國民黨為了擴大黨的勢力與財政問題，孫中山先生遂採取「聯俄容共」的策略，由於兩黨基本理念與背景動機根本無法相容，⁴²遂造成日後兩黨的相互交惡與引發

⁴⁰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⁴¹ 「二十世紀之世界革命必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共產國際正負此重任，所以共產國際於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大會即已發佈宣言書，明定其大政方針，一九二〇年第二次大會之宣言及章程更明定：共產國際以『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創設統一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達完全消滅階級，實行社會主義』為目的。」瞿秋白：〈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共產國際之策略問題〉。

⁴² 「這種結盟伊始，無論在兩黨之間還是在國民黨內部，都成了經常性的關係緊張和衝突的根源。其原因不僅在於兩個政治素質根本不能相容的政黨，最終表明二者絕對不能共生，主要原因在於，共產國際的底牌，乃是借助共產黨人把民族改良主義的國民黨，變成一個激進的革命的『全民黨』，一個『工農黨』，一個近似共產主義政黨的『雅各賓』黨。……國民黨接受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則又希望將共產黨溶化在國民黨隊伍中並將其吞併。」以上也許可以多少說明國共兩黨各自背後的複雜動機。李玉貞譯：〈俄文版編者前言〉，收於《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卷1，頁11-12。

衝突，而衝突的結果，必然導致眾多爭論的產生，這也就是1924年至1927年，從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到蔣介石實行「清黨」工作，「民族主義」一詞較之前又興盛起來的主要原因。（參見圖二）

四、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爲什麼排滿與不排滿的問題如此重要？且這一連串引發而來的種族革命問題，也連帶牽動了「民族主義」功能類型上的變異性，從圖一可看出，1906至1907年是第一種「種族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達到最高峰的時候，這當然跟《新民叢報》與《民報》在刊物上的論戰，有極大的正相關；另一方面，「民族主義」乃是西方建設現代化國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而移植到中國，始由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感，才想到要建構一個新式的「國家」，而這「國家」與傳統皇朝的「天下觀」是不同的，新式的「國家」觀不是如過去採開放式的疆域觀或是夷狄之分的觀點，而是改採以承認中國與事實上與其他國家是等同的概念。因此，國家的主權以「民」爲主，但此「民」是由哪些人一起組成的呢？這是興起排滿及種族革命論的源頭。然而，我們不禁還是要問，那麼「排滿」與「民族主義」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試以胡漢民（1896-1936）撰述的〈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一文探討之，他說：

自嚴氏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釐然當於人心。而中國民氣爲之一變，即所謂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滿者，固爲風潮所激發者多。而嚴氏之功蓋亦匪細，嚴氏乃懼其僅爲種族思想不足以求勝於競爭劇烈之場也，故進以軍國主義而有社會通詮之譯。……矧吾種尚自他壓制之憂，內不能脫於異種人之軛，即外不能與異國人之捷足爭，其理甚明。……爲中國民族計者，同時以民族主義而排滿人，即同時以軍國主義而期自立，非排

滿不能自立，一義也；而非兼講軍國主義不足以排滿，即足以排滿，而不能自立，種雖存，亦將為猶太人之續，此又一義也。⁴³

胡氏此文，乃據嚴復翻譯甄克思《社會通詮》一書所言而有感，其言執「民族主義」就是「排滿」，「非排滿不能自立」的說法，依然是這群排滿人士最重要的論述，但排滿還要兼以實行「軍國主義」，否則會像猶太人漂泊流浪、無家可歸，沒有自己的「國家」一般。蓋胡氏的想法，同時也受嚴復引進物種進化論影響所致，因而認同物競天擇的概念，換句話說，為了與諸國競爭，中國內部除了要倡言「民族主義」來「排滿」之外，也是為了「保種」。但持此「種族認同」的民族主義，也僅能「保種」，並不能「自強」，⁴⁴在面臨對內「排滿」與對外「保種」的強大壓力之下，中國對外則要儘速建立一個強盛的「國家」，才既可保護人民，亦可抵禦外敵。那麼，用什麼方式／主義建立新的國家？胡漢民於是提出實施「軍國主義」的看法，當然，這樣的想法，雖說有部分人士的支持，但當時輿論的主流，大抵還是脫離不了「立憲」與「共和」的兩條主線。

像這樣將「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兩主義區分的手法，本始於梁啟超，但後來連《民報》等的論述，也都重新定義上述的兩個主義，汪精衛於1907年撰寫〈研究民族與政治關係之資料〉一文，內容再次強調「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密切關係，非為時人所

⁴³ 胡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民報》第2號，1906年8月2日，頁245-246。

⁴⁴ 按：「嚴氏惘乎專言宗法社會主義，而忘軍國主義者，將能保其種而不能自強，甚且有種存而國亡之禍。故論次猶太而及中國，其言云：『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吾人種智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其意欲使人人言軍國主義以期自立，而未嘗以排滿者為非。」參見胡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頁242。

言轉而施行軍國社會。首先，汪氏對於「民族主義」一詞，有新的定義，他說：「吾輩所主張之民族主義，固非單純血族的觀念也，實乃發生於民族與國民之關係之間。」⁴⁵ 這已與先前的強烈排滿語氣，似乎較有理性客觀分析的言論，民族與國民的關係為何？汪氏指出「民族」是指族類方面而言，「國民」則以政治方面言之，兩者有共通的問題，那就是同一民族，是否為一國之民？抑是一國之民，果真只有一民族？他提出自己的見解：

有兩大例。(一) 以一民族，為一國民。(二) 民族不同，同為國民，其中復分為二：(甲) 以不同一之民族，不加以變化，而為同一之國民者；(乙) 合不同一之民族，使同化為一民族，以為一國民者，而同化公例凡四，我民族當於此四公例中，求其位置，吾輩所主張之民族主義具如此，非宗法社會所特有之民族主義，乃軍國社會所不能廢之民族主義也。宗法社會之民族主義，所爭者在族系，軍國社會之民族主義；所爭者在政權。民族不同，而同為國民者，其各民族所得之政權，往往不能平等。⁴⁶

汪氏這樣的說法，實與嚴復、胡漢民等人皆有一脈相承的觀點，也就是他們排斥宗法社會之民族主義，而希冀奉行軍國社會的民族主義。由於軍國社會之民族主義爭的是政權，各民族亦形成不平等的狀態，但這太容易造成極端的民族主義，汪氏又再次申明其「民族主義」，謂：

吾輩所主張之民族主義，欲使諸民族，同化為一民族，以為一國民也。非謂捨漢族外，不許存在於中國之內，乃謂使諸民族同化於漢族，以為中國之人也。蓋民族雖不同，而同化之後，

⁴⁵ 汪精衛：〈研究民族與政治關係之資料〉，《民報》第13號，1907年5月5日，頁2156。

⁴⁶ 汪精衛：〈研究民族與政治關係之資料〉，頁2156-2157。

自能生共同心，於是則立國之最大原質。⁴⁷

汪氏此說，雖還是歸為種族認同的「民族主義」類型，但已有將「排滿」、「保種」等嚴苛的語詞，作一適度調整內容的講法，換句話說，汪氏等排滿人士所要說明的是就長久的歷史經驗看來，各民族皆被漢族所同化，連滿人也是，但當時漢族尚處於低下的位置，滿族尚在統治階層，因為只有漢人才能完成「同化」的大業，⁴⁸此即排滿的根本原因。這樣看來，排滿的「民族主義」，除了與種族認同相關之外，也引借了漢人歷史文化的優越感，來更加證明排滿的重要性，惟其如此，漢人有權利去融其他民族為一民族，使之皆成為中國人，如此，才能使國家壯盛而強大。⁴⁹

此外，章太炎是《民報》的中堅人物，亦是堅持排滿的種族革命倡導者，在其〈社會通詮商兌〉一文中，也針對嚴復翻譯甄克思的《社會通詮》一書，提出不同的思維向度，他說：

英人甄克思著社會通詮，侯官嚴復譯述著錄，其所言不盡關微旨，特分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為三大形式而已。甄氏之意，在援據歷史，得其指歸。……民族主義者，與政治相系而成此名。非脫離於政治之外別有所謂民族主義者，然就嚴氏所譯甄說，則民族主義或為普遍之廣名，如是則外延甚巨，

⁴⁷ 汪精衛：〈研究民族與政治關係之資料〉，頁2161。

⁴⁸ 「至於今之言排滿者，則以滿族尚居征服者之地位。漢族尚居被征服者之地位，未脫離被征服者之地位以前，同化問題，無自發生故也，吾輩所持之民族主義具如此。」汪精衛：〈研究民族與政治關係之資料〉，頁2162。

⁴⁹ 「吾輩所主張之民族主義，謂使諸民族，同化為一民族，以為一國民。……中國他日若言民族同化，必以漢族為模範，而使他族悉以漸醇染焉。蓋創立中國者漢族，光復中國者漢族，能使中國轉危為安轉弱為強者亦漢族，故容納他族者，漢族之權利，而非漢族之義務。而既容納他族，則必使之同化以無貽國家憂者，則非惟漢族之權利，抑亦漢族之義務也。至於為他民族計，使其不欲入居中國則亦已耳，苟其欲之，固未有不樂中國之強者。」汪精衛：〈研究民族與政治關係之資料〉，頁2167。

而足以虛受三種形式。⁵⁰

章氏將甄克思的思想內容概分為三大形式，一為「圖騰社會」，二為「宗法社會」，三為「軍國社會」，再一一的分別駁斥此三種社會若實行中國皆有其缺失，但他所謂的「民族主義」，又與政治密不可分，這是從梁啟超、汪精衛等人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之後，首度將「民族主義」與政治國家再度緊密連繫起來的說法，然而，章氏的「民族主義」要如何的嵌入政治當中呢？他說：

會黨發源，多在晚明之遺老。蓋攝取國家觀念於民族主義之中，而組織固猶未備者也，自有會黨，而其人糧不宿春，襍被遠行，千里無饑寒之患，其在同黨，雖無葭莩微末之親，一見如故，班荆而與之食，寶刀可脫也，輕裘可共也，左驂可解也，斯無待祠堂義莊之補助，而宗法社會之觀念自滅。⁵¹

由上述，溯其歷史傳統，早在明末清初即有有志之士的聚眾會黨，章太炎也很明顯地要將國家觀念植根於「民族主義」之中，也就是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合而為一，而前述的三大社會，既為章氏所否定，乃提出「黨」的組織概念，共同組成的黨派組織，可以一起同甘共苦，互相扶助，遂能達成其共持的理想，順此，從一路的排滿革命與政治革命的爭論下來，章太炎把「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兩分的支線，遂整合於「民族主義」的涵意之內，章氏說：

是故隨順有邊，既執著國家矣，則亦不得不執著民族主義。然而其中有廣大者。吾曹所執，非封於漢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於他之強民族而盜其政柄，奴虜其人民者，苟有餘力，必當一匡而恢復之。⁵²

⁵⁰ 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民報》第12號，1907年3月6日，頁1739、1738。

⁵¹ 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頁1743。

⁵² 章太炎：〈五無論〉，《民報》第16號，1907年9月25日，頁2546。

此段話意味著「國家」與「民族主義」合流之後，才能團結於一力，激發愛國情操，脫離受滿人壓制的奴隸生活，恢復漢族的地位，輔助其他弱小的民族，使其同化於一民族中，得完全有獨立平等的地位。至此，「民族主義」遂與建立現代國家的內在愛國、團結精神融合在一起了。

接下來，沉寂了約十年以上的「民族主義」一詞，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於「五四」時期引進的馬列思想，快速地在中國知識界發酵。另外，中國國民黨亦挪用「民族主義」之辭彙，納入其黨的理論架構中，其「民族主義」為「三民主義」之第一主義，為一方面要打破辛亥革命時期以漢民族獨尊單一的種族民族主義，期望融合國內各民族，並要求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則因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內又有軍閥割據，進一步要求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在〈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文中，其言：

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其在實業界，苟無民族主義，則列強之經濟的壓迫，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其在勞動界，苟無民族主義，則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目足以蝕其生命而有餘。……吾人欲證明民族主義以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實發揚國民能力。蓋惟國民黨與民眾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真正的自由獨立始有可望也。⁵³

上引文「民族主義」一詞，可見其欲與帝國主義、資本家劃清界限、並意圖親近一般民眾的意味，但質而言之，此「民族主義」一詞，實屬於「建立現代國家」的功能類型，也就是說，其目的性依然是為求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主權國家。固然，一個黨的組織理念，

⁵³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也可以是對自己「國家」服務的認同態度，但弔詭的是，這篇宣言，直把「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⁵⁴等同於「國家」的唯一宗旨，「三民主義」本為國民黨的基本意識形態，但經過這樣的會議，搖身一變為全國人民該遵循的「主義」，⁵⁵黨會的宣言，形同治國之宣言，而中華民國憲法因抗日關係，延至民國35年，才由國民大會通過，民國36年頒布實施，第1條明文即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事實上，從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即自行擔負救國救民的責任，黨國體制，已然成形。另一方面，國民黨之所以在國會中成為第一大黨，除了吸引許多新舊知識分子的加入之外，實其有完備的黨綱與宗旨令人遵循。然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國民黨內部排斥共產黨的聲音愈益變大，陳獨秀是開啟與國民黨論戰的第一人，其內容大致分述如下：1. 國民黨右派及其相關黨員，直說「共產黨破壞國民黨」，⁵⁶但卻沒有直接證據說明那裡破壞，只言要不斷擴充國民黨；2. 既然國民黨主張「凡贊成革命的都應一律歡迎入黨」，⁵⁷但為什麼說共產黨引介農工群眾與中等學生是「成就」其勢力；3. 共產黨主張讓蒙古有自決權，有獨立自主的權利，但國民黨卻認為此為「鼓動蒙古人脫離中國」；⁵⁸ 4. 照《護黨特刊》上所言，主

⁵⁴ 「吾國民黨則夙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生路，茲綜觀中國之現狀，益知進行國民革命之不可緩。故再詳闡主義，發佈政綱，以宣告全國。」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⁵⁵ 「總綱（一）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其總統由國民選舉之。」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⁵⁶ 「他們共同的唯一口號是『共產黨破壞國民黨』，他們所謂破壞國民黨的證據、鐵證，都是指社會主義青年團七號團刊啟載『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共產黨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及『青年團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在這些決議案中，充滿了『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使全中國革命份子集中於國民黨』、『擴大且改進國民黨的組織』……如果是一個懂得中國文的人，能說這些議決案是破壞國民黨的鐵證嗎？」陳獨秀：〈我們的回答〉，《嚮導》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⁵⁷ 陳獨秀：〈我們的回答〉。

⁵⁸ 陳獨秀：〈我們的回答〉。

張主義、組織、革命黨單一，這樣的黨與二十世紀進步的革命黨並不一樣；以上由陳獨秀犀利的言語中，可見其站在反對立場批評國民黨的種種，皆言之有理；但就國民黨的內部而言，的確也有必要捍衛自家黨派意識形態的統一性。然陳氏指陳國民黨反對蒙古自決的問題，與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內容自相矛盾，⁵⁹ 突顯出兩個問題：一是「民族主義」一詞本身內容的複雜性，因為它既可以是鼓舞群眾團結一致的精神動力，又是劃清你我不同族群的限制與規範；二是「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衝突性，牽涉到的不僅僅是各個立場角度的不同，包括縱向的如領導人與人民的關係，抑是橫向的族群與族群間的關係，更是形成了各自權力角力的場域，甚而我們可以發現到連今日中國共產黨主政的當下，新疆、西藏、臺灣等的以民族主義自決問題，依然是一件相當棘手的事項。

五、結論

近代中國是個變動快速的年代，而政治更是充滿波譎雲詭的局勢，整個中國在二十世紀前後幾十年的震盪，幾乎沒有人可以肯定或確定它會走往那裡去，國家或「存」或「亡」的問題，不是僅有面對外在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已，更重要的是國家內部的自我意識要全面的改革，包括種族、政府體制、教育、農工商業，甚至於傳統的儒家思想體系等等，於是焉「革命」的口號響徹雲霄，「革命」的正當性意義也在此時被多數人所肯定與接受。⁶⁰ 而「民族主義」一詞，亦是流

⁵⁹ 陳獨秀：「國民黨大會宣言上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華民族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說：『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據此宣言，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卻實不是單單自求解放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並且鄭重承認國內各民族自決權，做那導言的人，如果真是一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確有細心把國民黨大會宣言再讀一遍的必要。若是自己連黨的大會宣言還不能了解、記得、奉行，那裡還有麼護黨的資格？」陳獨秀：〈我們的回答〉。

⁶⁰ 關於「革命」一詞在近代中國的流行狀況，可參考金觀濤、劉青峰：〈革

行一時的術語，隨著西方在十八、九世紀進行建構民族國家的風潮之後，終於在二十世紀初，由梁啟超於1901年引入中國，開啟「民族主義」的論述場域，一開始多為建構一新國家的功能形態出現，隨著《蘇報》、⁶¹《民報》的刊行，張開排滿革命志士的旗幟，以「種族認同」為主的「民族主義」，遂一直佔據著這個辭彙的重要功能性定義，而與《新民叢報》形成了兩大對立的派別，當然這與兩大報的主編或主導者的思想背景有絕對的正相關，但是從「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民族主義」詞條中的分析結果，發現一般人認為以梁啟超為主導的「文化認同」民族主義之功能性定義的詞條並不多見，反而是一群人圍繞著「種族認同」的民族主義功能性定義而爭論。事實上，眾所周知，梁啟超的思想多變，但唯一不變的核心概念是「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中國』」，⁶²這與他的初衷並無違背，但隨著持排滿的種族革命人士日益增多，梁氏即使關懷的目標不在「種族」問題，但喜愛談「主義」的他，又不喜「排滿」與激進「革命」的言論，也因此一起捲入這「論戰」的大洪流裡。

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到來，中華民國成立，「民族主義」一詞的使用率遂頓時銳減（見表二），銳減的原因涉及兩層次問題：一是就功能性而論，中國人為什麼要談「民族主義」？二是就理念上而言，中

命觀念在中國的起源和演變》，收於《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357-409。

⁶¹「《蘇報》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以日人名義在上海創刊，義和團亂後，被一中國人收買。初『力主變法，頗為讀者歡迎』，但光緒二十九年（1903）左右，轉為革命排滿，幾成為中國教育會及愛國學社的機關雜誌。《蘇報》明顯揭起革命排滿的大旗，是同年五月初章行嚴任主筆以後的事。……章炳麟與鄒容、章行嚴結為兄弟交一事，旋即造成使他們三人均成為《蘇報》主角的機緣。」小野川秀美著，李永熾譯：〈章炳麟的排滿思想〉，收於李國祁等著，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頁229。

⁶²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民族主義專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2年12月），頁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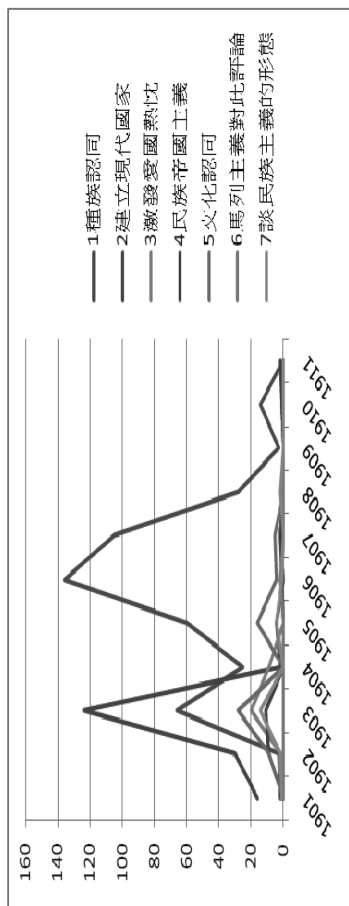
國人對「民族主義」的定義為何？首先，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從梁啟超引介「民族主義」一詞，當時正面臨大清皇朝內部的亟欲變革之際，也就是「建立現代國家」的最佳契機，「民族主義」適時地趕上了這股潮流；另一方面，中國內部也承繼了明末清初以來「反滿」情節及夾雜著漢族本有優越感的一股暗流，造成了以「種族認同」為主導的民族主義功能類型。因此，「建立現代國家」與「種族認同」的兩種功能類型「民族主義」，便可印證中國人當時為什麼要大談「民族主義」的原因。此外，1924至1926年，也有「民族主義」一詞復甦的情形，但此時「民族主義」的詞意，多轉向負面、批判性的語彙，其中又牽涉國、共兩黨對於「民族主義」的背後所選擇的意識形態。順此，回應第二個問題，在社會主義未引進中國之前，中國人對「民族主義」一詞的理解，多是正面性的語彙，也就是說，既能向內團結人民，凝聚集體的愛國意識，又外抗強敵的最佳利器。但隨著二十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膨脹勢力，剛以「民族主義」建立國家的中國民族，一些知識分子也一方面開始質疑「民族主義」，是否會等同於西方發展至「民族帝國主義」的階段？另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當前所關切的並不在乎「民族主義」一詞的真正內涵到底是什麼，而是「民族主義」可否帶領中國走向與西方平等的地位，並免於被列強欺凌的半殖民國家？誠如鄭永年所言「中國民族主義是對外來壓力的一種反應，國內民族主義的高低程度取決於外來壓力的強度。」⁶³事實上，中國式的「民族主義」，一直忽略了除了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目標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後續建設——建立國家可以永續經營的民主制度，這是中國長久以來以「民族主義」為政治訴求口號之弊端。

因此，不管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一詞的如何變化其功能性的意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已取得連體的密切關係，換言之，隨著辛亥共和政體的建立、中華民國的誕生，「排滿」的「種族

⁶³ 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30。

認同」民族主義不再是問題，接續的國、共兩黨，乃利用各自對「民族主義」的詮釋，試圖納入其各自黨的意識形態中。因此，1901至1911年間，「民族主義」一詞，其功能性的價值意義已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而1912年以後的「民族主義」一詞，乃關注於民族與國家認同的深化性議題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與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分別在1920年代以後，各自對「民族主義」進行黨的意識形態新詮釋，但據「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的研究顯示，在「容共」與「清共」的兩項歷史事件發生中，「民族主義」一詞的功能性爭論，亦即它到底對中國實現獨立自主的國家，是利還是有弊？依然是引起不小的波瀾。至今，「民族主義」又成爲熱門的政治術語，各個政黨似乎也忖度著如何來運用它，並獲取得更多人民的國家認同，因爲越多人民認同其黨的意識形態，就是指涉黨能愈益擴大其權力範疇，並引領該黨直接主導國家重大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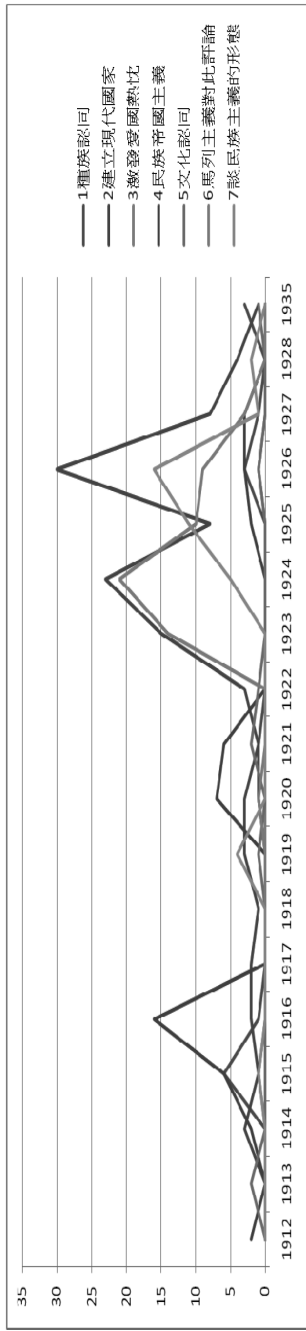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蔡嘉華）



圖一：1901-1911年「民族主義」一詞功能類型表

表一：1901-1911年「民族主義」一詞出現次數表

功能類型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 種族認同	2	3	66	25	60	136	105	28	3	14	0
2. 建立現代國家	16	30	124	2	4	0	2	0	0	1	0
3. 激發愛國熱忱	1	2	20	9	0	1	0	0	0	0	0
4. 民族帝國主義	0	9	11	0	0	1	2	0	0	1	2
5. 文化認同	0	9	28	0	16	4	5	0	0	0	0
6. 馬列主義對此評論	0	0	0	0	0	2	0	0	0	0	0
7. 談民族主義的形態	1	2	14	0	4	1	0	2	0	0	0
總計	20	46	263	36	84	145	114	30	3	16	2



圖二：1912-1935年「民族主義」一詞功能類型及出現次數線圖

表二：1912-1935年「民族主義」一詞功能類型及出現次數表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35
1. 種族認同	0	0	0	6	1	0	0	0	1	1	0	0	0	0	3	1	0	3
2. 建立現代國家	0	2	3	1	2	2	1	3	3	1	3	15	23	8	30	8	4	1
3. 激發愛國熱忱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4. 民族帝國主義	2	0	2	6	16	0	0	0	7	6	0	0	0	2	3	3	0	0
5. 文化認同	0	0	0	0	0	0	0	1	0	2	1	0	0	0	1	0	0	1
6. 馬列主義對此評論	0	0	0	1	0	0	0	0	1	0	0	14	21	10	9	3	0	0
7. 談民族主義的形態	0	0	0	1	0	0	0	4	0	0	0	0	5	11	16	1	2	0
總計	2	2	5	15	19	2	1	8	12	10	4	29	49	31	63	16	6	5

徵引書目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 方曉虹：《中國新聞史》，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
- 李貞玉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1卷，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
- 李國祁：《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
- 李國祁等著，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 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民族主義專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2年12月，頁49-119。
-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3年第2版。
- 林明德、黃福慶合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下合訂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 羅志平：《理論、類型與學者》，臺北：旺文社，2005年。
-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檢索日期：2010年11月6日。